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郝 涛 著

杜伊威尔的 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The Research on Dooyeweerd's
Social-Political Philosophy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郝 涛 著

杜伊威尔的 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The Research on Dooyeweerd's
Social-Political Philosoph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 郝涛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1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ISBN 978 - 7 - 5201 - 1621 - 3

I. ①杜… II. ①郝… III. ①杜伊威尔 - 社会哲学 -
政治哲学 - 研究 IV. ①B5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8462 号

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

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研究

著 者 / 郝 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王 绯

责 任 编 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5 字 数：25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621 - 3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在美丽的榕城白马河畔，有一个由中青年哲学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他们以理性的激情，把哲学反思的视野投向当代社会发展，试图以“哲学与社会发展文丛”为题陆续推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与他们作深入交谈中，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哲学学养和睿识以及他们对哲学与时代的那份眷注、担当的情怀所打动，欣然应邀为该文丛作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造就了中国社会实践的辉煌，也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发展。从历史反思到实践观念，从体系创新到问题意识，从经典诠释到话语建构，哲学在把握时代的同时也被时代所涵养化育，呈现多样化的研究面相。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转型过程中，哲学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哲学不应该以思辨的精神贵族自期自许，而应该回归生活世界。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的“贴在地面行走，而不是云端跳舞”，哲学应当“接地气”——在时代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获得鲜活厚实的“地气”。社会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哲学必须也能够以其理性的力量在反思、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特点、趋势中获得自身发展的生机活力，拓展出新的问题域。

当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转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改革与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日益显现、暴露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并非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有了其出场的语境。诸如：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结构的重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公平正义问题，社会失范问题，发展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等，社会发展以问题集呈现在世人面前。



前。问题表明发展对理论需求的迫切性。当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复杂性、长期性、风险性需要克服单线性的进化论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把握也不能停留在具体的经验实证的认识层面上，全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全新的发展理念来烛引，对发展的具体的经验的把握必须上升到哲学的总体性的层面上来。因为，在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研究中，哲学的视角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方向性的特点，它是以理性的反思和后思的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前提、根据、本质、价值、动力、过程、规律、趋势、模式和方法等作出整体性的观照。这种反思使我们能够超越和突破对社会发展的经验的、狭隘的眼界，在总体性、规律性、价值性和方向性意义上获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性的自觉性和预见性。在这个意义上，唯有哲学，才能够对当代社会发展既在后思的意义上充当黄昏后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又在前引的意义上充当报晓的“高卢雄鸡”。

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哲学部的中青年哲学学者正是在上述的意义上试图以哲学的多视角的反思性方式介入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在社会发展的元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反思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本质与价值、方法与模式、历史与逻辑、比较与反思以及社会发展的世界经验与中国经验等方面拓辟哲学观照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域。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愿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学术之间形成互动的张力，对时代实践的要求作出哲学的回应，从中寻找哲学自身的生长点，造就一个哲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点。

在一个急功近利、浮躁虚华的年代，他们以一种哲学的淡定和从容来反思时代，充当哲学“麦田的守望者”。我祝愿他们，并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有更多的哲学学术成果问世。就像白马河畔那根深叶茂的榕树一样，有他们哲学思考的一片榕荫绿地。

李景源

2014.5.6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2
第二节 处于危机中的政治哲学	8
第三节 杜伊威尔的先验性批判	12
第二章 杜伊威尔的哲学本体论	24
第一节 前本体论思考	26
第二节 类比理论	28
第三节 十五个“样态”	29
第四节 “样态”排序规则	35
第五节 “样态”普遍性原则	38
第六节 “样态”不可分割原则	41
第七节 规范类“样态”	42
小 结	48
第三章 杜伊威尔社会政治哲学的背景及其基本概念	54
第一节 历史思想背景	55
第二节 基本概念	90
第四章 杜伊威尔的社会哲学	131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划分	132



第二节 制度性结构	143
第三节 非制度性结构（社会自发组织）	155
第五章 杜伊威尔的国家哲学	161
第一节 政治、正义与国家	162
第二节 国家的结构性准则	165
第三节 国家本质	171
第四节 国家内在目的	192
第五节 国家组织形式	205
第六节 国家整合职能	213
第七节 基督教国家	221
第六章 对杜伊威尔社会政治哲学的反思	226
参考文献	234

第一章 绪论

赫门·杜伊威尔（Herman Dooyeweerd，1894—1977），20世纪荷兰最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改革宗神学家，生前曾经长期担任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其思想在荷兰、北美和南非的加尔文主义者中有着很大影响。杜伊威尔的主要著作有《理论思想新批判》（三卷本，1935年）、《暮色中的西方思想》（1960年）和《西方文化之源》（1979年）等，这些著作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诸多哲学领域，构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杜伊威尔的哲学思想很有原创性，有评论者甚至赞誉他是自斯宾诺莎以来荷兰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

笔者拟研究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这个方面，杜伊威尔反对还原论，坚持社会结构多元论，认为国家、学校、宗教、科学、艺术、医疗、慈善组织等社会结构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和方式，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其他社会结构之上的绝对权威。为了避免社会结构成为一盘散沙，他赋予国家这个社会结构以特殊的任务，认为国家能够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个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并维护社会和谐与统一。

通过对杜伊威尔社会政治哲学的系统性研究，笔者希望可以揭示荷兰加尔文主义的精华，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贡献一分力量。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意义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对杜伊威尔哲学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在西欧以荷兰和英国为主，在北美则美国和加拿大都有涉及。下面笔者主要介绍杜伊威尔哲学研究的代表作品。

第一，荷兰的研究成果。

著作 1： *Wisdom for Thinkers: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Philosophy*, by Willem J. Ouweneel (Paideia Press, 2014)

这部书是最近一部研究加尔文主义哲学的著作，系统地呈现了荷兰加尔文主义基督教哲学的思想体系。作者首先提出哲学的概念并回答了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哲学是基本的科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其目的是回答关于知识、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哲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和具体的科学不同，哲学试图了解世界的整体画面，因此是我们理论和科学思想的出发点。但是作者接着追问哲学的根基又是什么。作者认为哲学的根基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前哲学的、前科学的、前理论的。世界观是关于世界的本源性认识，关乎我们对生活意义的认知。因为世界观具备明显的主观倾向，所以建立在其上的哲学也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无偏见的哲学，哲学一定预先设定和认可了某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探讨看上去有些过时了，哲学越来越具备实践方面的智慧，比如说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M. Taylor）。前者主攻道德政治哲学，而后者主攻社会政治哲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作品预设了某种世界观和认识论，这种预设往往发生在潜意识中。在阅读查尔斯·泰勒作品时，我们会感慨他的智慧，但是会常态性地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智慧究竟在什么样的思想框架中运行呢？他的观点



是中立的、客观的、没有偏见的吗？……

作者通过一系列问题慢慢地导向基督教哲学的宗教动机、时间观、存在论、人类学等等，展现出了杜伊威尔基督教哲学的整体框架，是研究杜伊威尔哲学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

论文 1：“Theories of Modes of Beings (modalities)”，by R. von Woudenberg

中文的翻译是《存在模态的理论》，这篇论文并未公开发表，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哲学系教材，目的是系统介绍杜伊威尔的形而上学一样态论。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系统阐述和讨论了杜伊威尔的十五个样态方面，它们分别是：算数性、空间性、运动性、物理性、生物性、心理性、逻辑性、历史性、语言性、社会性、经济性、审美性、法律性、伦理性和信仰性。在理解杜伊威尔样态理论方面，这篇论文至关重要。

第二，英国的研究成果。

著作 1：*Herman Dooyeweerd: Christian Philosopher of State and Civil Society*，by Jonathan Chaplin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2011)

这本著作是对杜伊威尔政治哲学最详尽和最系统的研究。作者是剑桥大学教授，该书由美国圣母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作者力图全面和系统地展示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轮廓和内容，并站在基督教神学和自由主义的立场，论证了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合理性，以及对多元化社会发展趋势的适应性。这部著作是研究杜伊威尔政治哲学不能跳过的资料。作者探讨了杜伊威尔哲学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以及其政治哲学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概念。

但是这部著作也有其局限性，作者不仅是一名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有坚定基督教信仰的哲学家。他过度美化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甚至主张可以用基督教立国。作者认为杜伊威尔所主张的基督教立国方式不仅不会给非基督教团体带来不公，反而会给非基督教团体带来公平正义，因而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作者不仅从思想意识上将基督教推到了上帝的位置，而且公开宣称用基督教的基本理念来治理社会和国家。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作者不能站在比较包容和开明的立场看待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不能从其他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它。虽然这部著作的内容比较详尽和系统，但是由于对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理解不够客观，所以在内容上多

有偏颇，有待更正。

论文 1：“Two Concepts of Liberalism,” by William A. Galston, *Ethics*, Vol. 105, No. 3 (Apr., 1995), pp. 516 – 534.

论文 2：“Rejecting Neutrality, Respecting Diversity: From ‘Liberal Pluralism’ to ‘Christian Pluralism,’” by Jonathan Chaplin,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35/2, Winter 2006), pp. 143 – 175. Awarded the “Charles J. Miller Christian Scholar’s Award” for the best article in 2006.

论文 1 和论文 2 关系非常密切，笔者把它们放到一起探讨。论文 1 的作者区分了立足于加尔文主义的多元化和源自启蒙运动的自治权理念。高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自由主义式的多元化社会。作者认为这样的政治架构不仅可以保障个体的自由，而且同时兼顾社会组织的自由—社会组织的诉求自由。国家的作用是缓和社会组织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只要个体拥有自由参与和退出社会组织的权利，相关社会组织中的非自由主义原则就应当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护。

对于高尔斯顿而言，多元化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公共政策和个人意愿共同作用的产物。作者所主张的多元性是有限的，而且其合法性是公共权力所赋予的。这其实赋予了国家过多的权力，公共权力成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者和赋予者。高尔斯顿认为，理想的多元化社会应当是国家一方面保护多元化，另一方面将多元化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上述多元化社会范式在论文 2 的作者查普林（Jonathan Chaplin）看来是不够清晰的，这种模糊性会把社会中的少数派团体置于公共领域的边缘，使它们无法有效地提出自身的诉求，只能被迫接受自由主义原则。查普林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式的多元化国家不能正确对待多元化。他认为中立国家是不存在的，任何政治理念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同的政治理念对待多元化的态度不同，对多元化的认同和限制也不同。从这个视角出发，查普林提出了基督教多元化国家的设想。他认为基督教多元主义会通过基督教原则来对待多元化——理想多元主义是高尔斯顿的范式加上更广泛的结构化多元主义。查普林提出基督教多元化国家具备下面几个特征：(1) 公共善是最广泛和最优先的善；(2) 在公共论辩中，基督教价值是主导性价值，特别是在处理强制性问题上，基督教价值必须具备优先权；(3) 基督教的结构性规范可以为政治社群提供强大的支撑，因为这些规范具备形而

上学的属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高尔斯顿和查普林都将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应用于现实问题，但是应用的方式和视角不同。前者应用于自由主义原则中，后者则试图用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来取代自由主义原则。这两篇文章都向读者展示了杜伊威尔社会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和局限性，是笔者写作的重要参考。

论文 3：“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A Neo-Calvinist Perspective,” by Jonathan Chaplin, in Jeanne Heffernan, ed., *Christianity and Civil Society: Catholic and Neo-Calvinist Perspectives* (Lanham, MD: Lexington, 2008).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借助新加尔文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凯波尔和杜伊威尔的思想系统论述了新加尔文主义式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组织方式。查普林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1) 社会组织内部的等级关系具备天然合理性，因为这是维持秩序的唯一方法，但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间没有上下的隶属关系；(2) 对效率的追求是社会组织内部等级制度存在的合理化论证；(3) 国家的目的是公共正义，除非公共正义遭到践踏，国家不得干涉社会组织的运作；(4) 每一个个体都体现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展现着不同的社会心理需求，国家应当尽量创造条件满足这些需求；(5) 国家必须重视宗教的公共角色，因为具备价值取向和信仰导向的原则对建立一个健康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健康的宗教为道德判断提供基石，是社会和谐的源泉。

第三，加拿大的研究成果。

著作 1：*Contours of A Christia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to Herman Dooyeweerd's Thought*, by L. Kalsbee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75).

这本书是杜伊威尔哲学体系的入门级读物，作者的主要目的是将杜伊威尔哲学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和概念用通俗的语言描述出来。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的例子来阐述杜伊威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深入浅出。该书虽然比较清晰地介绍了杜伊威尔哲学的基本概念，但是深度远远达不到高层次的学术要求。

第四，美国的研究成果。

论文 1：In the Struggle for a Christian Politics, James Skillen's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74).

这篇论文是美国公共正义中心（关于政策和宗教的智囊组织）前主席



杰姆斯·斯金伦（James Skillen）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系统地梳理了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思想的历史轨迹。作者的视野非常开阔，从基督教出现的那一天来寻找加尔文主义产生的蛛丝马迹，一直讨论到荷兰近代的加尔文主义者，最后以杜伊威尔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没忘记谈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到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宏大叙事，是了解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也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的原因，斯金伦对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讨论并没有达到系统的地步，有很多内容、方面都没有提及。

著作 1：The Myth of Religious Neutrality, by Roy A. Clouser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1st edition, 1991; 2nd edition, 2005)

作者明确提出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个全整性论说都不是中立的，在背后都有形而上学式的、不可更改的理念作为支撑。最典型的代表是自由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宣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制度架构上都是中立的。但是作者提出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根基是从人的本质概念当中推演出的“自由”理念，一切自由主义的价值都源于这个理念。也就是说，“中立性”是不存在的。作者在论述“非中立性”的过程中主要借鉴了杜伊威尔的哲学思想。在论证了“非中立性”之后，作者提出了“非还原论”的存在论。通过这种方式，作者系统阐述了杜伊威尔的存在论哲学，但是对社会政治哲学的讨论相对薄弱。笔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主要借鉴作者对杜伊威尔“存在论”的论述。

二 国内研究现状

笔者在《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论文，题目为《杜伊威尔的正义论初探》。在这篇论文中，笔者系统地探讨了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从杜伊威尔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到其政治、正义与国家的概念，再到杜伊威尔政治哲学最根本的原则——“领域主权”。笔者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是向学术界初步介绍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理念，并引出“领域主权”的概念。可以说，“领域主权”是杜伊威尔正义论的核心。但是这篇论文距离系统地讨论杜伊威



尔的社会政治哲学还很远。

笔者于2011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信任社群和领域主权—公共正义》。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探讨了杜维明的政治文化构想“信任社群”和杜伊威尔的制度设计之间的契合度问题。笔者追问：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否满足“信任社群”的要求，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能否为“信任社群”提供其所需要的结构性基础？自由主义有没有内在缺陷？在指出自由主义局限性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这篇论文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杜伊威尔的基本政治架构——领域主权和公共正义能否为杜维明的信任社群提供一个强有力结构性基础？这篇硕士学位论文涵盖的内容比较广，其中包括杜维明的儒家政治文化、自由主义和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由于这篇论文的目的不是系统地探讨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只是阐述其中的政治架构问题，所以对其政治哲学的探讨还不够全面。

三 研究方法与意义

笔者的主要目的是系统地理解杜伊威尔的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在讨论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之前，笔者会简单地梳理杜伊威尔之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但是，笔者的目的和方法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来讨论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围绕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发展”概念展开。“发展”这个概念当然包含历史因素，但是对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并不受历史因素（时间的先后顺序）的限定，笔者主要通过探究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关联来展开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框架。

具体而言，笔者首先通过荷兰加尔文主义者的视角呈现西方政治哲学的轮廓。在这个阶段，笔者主要使用杜伊威尔早期对基督教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完成于1924~1927年（《为基督教政治抗争》）。杜伊威尔认为这个时期的研究为他后期的政治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他后来声明已经不完全同意他的早期观点。杜伊威尔的这个早期研究主要遵照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讨论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的时候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呈现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杜伊威尔的政治哲学体系也体现于这些历史性的诠释中。但是在这个阶段，笔者的主



要目的还是集中在杜伊威尔之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发展轨迹，目的是为探讨杜伊威尔政治哲学奠定历史基础。

然后，笔者会探讨杜伊威尔哲学形而上学和存在论，这个部分是杜伊威尔哲学体系的根基，也是理解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钥匙。在这个过程中，笔者会系统地介绍杜伊威尔哲学的两个基本特点。它们分别是：（1）理论思想的超越性批判；（2）对四个宗教基本动机的分析。杜伊威尔认为这四个动机主导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与科学的走向。

在完成上面工作的时候，笔者会详尽地阐述杜伊威尔成熟期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两章集中探讨杜伊威尔的历史发展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公民观。笔者在这两章中会详细和系统地谈论杜伊威尔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从基本的政治哲学范畴到杜伊威尔对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乃至国家法和政党的认识，与此同时结合荷兰、美国的政治现实提出对杜伊威尔政治哲学的反思和批评，以求达到借鉴其积极方面的效果。

第二节 处于危机中的政治哲学

杜伊威尔政治哲学开始于他对政治哲学学术界严重危机的回应。在他看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大陆弥漫着严重的文化与政治危机。杜伊威尔对政治哲学的反思反映了当时欧洲的文化与学术气氛。他相信，政治理论中的危机从本源上来讲并不是理论的危机。体现于政治哲学中的危机是社会思想一般性危机的集中体现。这种集中体现又展现了一种更为深层次的精神真空——此真空来源于崩塌的人文基本动机。正像他第一部政治理论主要著作题目所展示的那样：《关于国家人文主义理论的危机》。仅仅在几年后，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也提出了与杜伊威尔上述危机理论相似的理论“人道主义的悲剧”，并且提出这种悲剧就是文化与政治危机的源泉。

这种危机的主要特性是指关于国家规范性结构观点的缺失。杜伊威尔认为，国家结构是持续性的、稳定的。当相对主义的国家结构理论出现并开始动摇人们对国家结构稳定性认识的时候，国家理论的周期性危机就产



生了。杜伊威尔对国家理论的理解与其对所谓“神圣秩序”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国家理论的危机就是错误地理解了国家结构的神圣秩序。这里所说的错误理解又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承认“神圣秩序”的存在并且承认国家的结构就体现了这种“神圣秩序”，但错误地诠释了国家结构性准则的内容；第二，根本不承认“神圣秩序”的存在，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否认国家结构是持久的规范性结构。虽然杜伊威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他认为这两位古圣先贤正确地认识到了国家的“规范性本质”是对任何现实国家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基础。虽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本质被错误地诠释为“形而上学的谬误”，但是杜伊威尔认为他们没有陷于现代历史实证主义的窠臼当中。这种历史实证主义将国家政体视为一种可变的历史现象，缺乏任何规范性结构准则的历史现象。杜伊威尔认为正是这种历史实证主义导致了国家理论的阶段性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比以往更广泛、更严重。

杜伊威尔认为，上述危机中的一些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通向政治生活的新的更具有规范意义的过渡阶段。杜伊威尔提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念，这种国家理念产生于衰亡的中世纪政治框架并与其划清了界限。其他的危机，在杜伊威尔看来，非常具有毁灭性，比如说出现于雅典民主衰落时期的左翼智者派危机。现代人本主义国家理论中的理论危机具有很强的毁灭性。虽然一战后政治生活的危机催化了这种理论危机，然而这种理论危机却是宗教与哲学漫长衰落过程的必然结果。

在杜伊威尔的时代，关于国家的理论面临着僵局。他认为这种僵局在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没有为持久的规范性结构留有任何空间。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相比，现代政治思想将国家视为一种绝对变化的历史性现象。这种观点是杜伊威尔评估国家理论危机的核心点。当代政治理论在这种国家理论危机中发展到顶点，杜伊威尔称当代政治思想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国家理论。德国理论家理查德·施密特（Richard Schmidt）是这样描述当代政治理论的，“政治理论从推测性的观念中解放了自身；它抛弃了关于国家观念的形而上学追问并将自身限定于经验世界当中。”

杜伊威尔认为，罪魁祸首是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这两个主义导致了社会思想的普遍衰弱，同时这两个主义也是采用内在立足点所导致的社会



思想困境的集中显现。一旦思想家们试图仅仅通过特定的样态方面或具体的典型结构来解释整个世界的话，那么这种困境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不平衡的对于某个具体样态或典型结构解释能力的依赖必然会导致此种样态或结构的绝对化。针对特定典型结构的绝对化，杜伊威尔没有提出专门的术语，但是杜伊威尔将特定样态的绝对化称为机能主义。机能主义仅仅通过特定样态功能的方式来建构对各种现象的解释，从而忽略了特定样态发挥功能的特定个体结构。社会思潮中各式相互竞争的主义可以在对样态功能绝对化的机能主义中找到解释。杜伊威尔提到了法学界的例子，纯粹法学理论将法学研究还原到实证的法学形式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法律逻辑通过机能主义的方式被绝对化。杜伊威尔强调这种忽视国家结构性准则去构建宪法理论的努力是徒劳的。社会理论主要学派的分歧不能仅仅通过社会不同样态与方面的科学性专业化得以解释。每一种社会理论学派都表示它们可以通过自己认可或看重的特定样态来解释整个社会。每一个社会理论学派解释整个社会的方式都可以归结为找寻社会中不同社会现象的基础分母。因为它们都坚持相互不可通约的范式，所以它们之间的相互综合就成为不可能。一种绝对化不可能通过其他的绝对化得以纠正。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就是将社会现象中的历史方面绝对化所导致的。历史主义者会拒绝任何超历史的结构性准则，他们认为除了历史方面与样态外，其他的方面与样态不能评判历史进程，历史发展只能通过历史样态得以解释。类似的，实证主义强调所有的现象必须通过知觉到的因果互动关系才能得以解释。这种思维方式就将人类知识的感知方面绝对化了。杜伊威尔强调，上述两种绝对化都是不正当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面对的共同问题是二者都没有看穿表面现象。仅仅看到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形式，结构性准则便无从发现。被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主义占据的社会理论系统地忽略了那些作为人类存在与社会现象基础的结构性准则。

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特点以及二者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有差别的。杜伊威尔认为，历史主义是时代的谬误。现代历史主义将文化解释为不间断的历史发展，它拒绝所有让这些发展得以可能的稳定持续的被创结构。所以说，历史主义缺乏一种可靠的标准去区分历史发展的反动性或进步性，它所塑造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标准的时代。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将事实与标准和价值割裂。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试图将社会现象解释为